反击极左谣言问答合集

Q：我国公有制经济还占主体地位吗？

A：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结果显示，截至2012年末，我国公有制资产288.99万亿元，在社会总资产中占比达到55.78%。在我国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经济占有主体地位。研究报告介绍，我国所有制结构调整使公有制经济效率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不但没有危及，相反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社会主义性质。

Q：我国医疗行业公有制占比多少？

A：《2019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指出：2019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床位880.7万张，其中：医院686.7万张（占78.0%），基层医疗卫生机构163.1万张（占18.5%），专业公共卫生机构28.5万张（占3.2%）。医院中，公立医院床位占72.5%，民营医院床位占27.5%。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政府办床位占93.3%。由此可见，在我国医疗行业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

Q：我国的国有制是全民所有的吗？

A：是的。全民所有的性质是《宪法》《企业国有资产法》规定的。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就充分体现了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发展成果全民共享。

Q：我国八十年代经济发展得怎么样？

A：1979——1988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6%，超过前26年（即1953——1978年）年均增长6.1%的速度；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6.2%，超过前26年年均增长2.7%的速度；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2.85，超过前26年年均增长11.4%的速度。

Q：四人帮对科研的态度如何？

A：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回忆说：“那时‘四人帮’有个计划，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年轻些的已被搞得非常之惨，那些忠实可靠功劳很大的人都被打成了特务，很多人遭了殃。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有个很有贡献的炸弹专家钱晋，他们拷打要他承认是特务，他坚决不承认，结果被活活打死。年轻的一批搞光后就轮到高层的了。因为不能在北京搞，他们就把邓稼先调到青海的‘221基地’去，组织了一批士兵和工人去斗他，理由是有两次核试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抓住科学测试的失误上纲上线，目的就是要把负责人邓稼先搞掉。就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振宁要见他。周恩来命令把邓稼先召回了北京，侥幸得救。”

由此可见，四人帮对科研持破坏态度，两弹一星也是抵制文革干扰所取得的成就，

Q：文革对科研的破坏有多大？

A：“文革”开始后，清华大学的科学研究基本停止，研究人员流失，实验室关闭。据1976年统计，学校从事科学研究的教师仅占在职教师总数的10%以下，学校实验室及仪器设备也遭到严重破坏与损失。据1977年8月学校对各实验室科的调查统计，从1966年6月至1977年4月，清华大学仪器设备损失约1800万元（约占原仪器设备总值的一半），实验室家具丢失1万多件，实验室工作人员从1100多人减少到500多人，其中实验技术人员从480人减少到180人，有三分之一的实验室需要重建。

1968年7月3日，中科院革命委员会宣布全面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在清队中，科学院许多知识分子和干部被立案审查，遭到非法监禁、残酷折磨、刑讯逼供。当时，科学院京区职工总数9279人，被群众专政和隔离审查的881人，占9.5%；其中被定敌我性质的102人，占京区总人数的1.1%，为受审查人数的11.5%。到1968年底，京区7名院级干部都成为“打倒对象”；71名厅局级干部和192名处级干部中，分别有59名(83%)和99名(52%)被列为“打倒”或“重点审查”对象；副研究员以上高级研究人员180名中，被立案审查的107名(59%)，其中83人工资被扣，每人每月仅发给相当于原工资6%的生活费。“文革”十年，科学院全院被抄家的达1909户，被迫害致死的229人。

Q：江青这个人怎么样？

A：江青生活非常腐朽。

江青的秘书杨银禄在回忆录中写道：“江青喜欢吃既清淡又有营养的饭菜。炒菜、烧汤不喜欢用骨肉汤,也不喜欢放味精。她说,骨头汤里胆固醇高,味精是化学制品,有有害物质。但是,她喜欢菜里汤里有骨头汤和味精的美味。她吃鸡蛋只吃蛋清,不能有一点儿蛋黄,她说蛋黄里有胆固醇。吃雏鸡要半斤的,鱼要掐头去尾,只吃中间的。螃蟹只吃公的不要母的,她说母螃蟹胆固醇高。菠菜要做成菜泥,芹菜要抽掉筋,豌豆要剥去皮,绿豆芽要掐掉头和尾。饭菜的温度要求适度,既不能烫嘴,又不能不热。她不但喜欢吃中餐,还喜欢吃西餐,喜欢吃法国、德国和俄罗斯式的点心。江青喝的水既不能凉,也不能烫。有一次,她要水要得急了一些,水温稍微高一点,就说护士故意烫她,用力把水杯摔个粉碎。江青吃水果也要求有一定的温度,把苹果切成长条,泡在温水里,浸泡得温度适度时,她再吃。”

在杨银禄的记忆里，江青是个冷酷无常的人。

他回忆，1968年1月2日，他调到江青办公室工作没多长时间，突然接到老家“父病危速回”的加急电报。第二天，又接到“父病故速归”的加急电报。噩耗传来，他悲痛欲绝。杨银禄说，回家安葬了父亲之后，由于极度悲痛，他患上了急性胃肠炎，上吐下泻，发高烧，病得不能动弹。结果因为江青怀疑身边有不可靠的人，派人把病中的他叫回了北京。

江青多疑到了什么程度？杨银禄回忆，当时江青质问他：“我问你，你前几天回老家干什么去了？”他回答：“我父亲去世了，经请示汪东兴同意，回去料理丧事了。”江青并不相信：“你父亲去世是假的，是有人故意把你支走了，是戚本禹他们把你支走的，他们好干坏事。”杨银禄赶忙解释：“别人做什么事情我不清楚。我父亲真的是去世了，你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派人找中央警卫团政治部的毛尚元同志调查，是他到我老家把我接回来的，是真是假他是清楚。”江青听了这个的解释，认为有失她的威严，大声吼道：“你在撒谎！我现在就派人到你的老家把坟墓扒开，看看尸体是不是你的父亲？如果不是，看你作如何解释？如果不是，你就犯了欺君之罪！”而且她一边说，一边站起来，把筷子狠狠地往饭桌上一摔，双手叉在腰间，用更高的声音狂叫：“你，你刚刚来我这里，就敢跟我顶嘴，以后还了得，你给我立即滚出去！”

江青还爱给身边的工作人员相面，想通过他们的表情判断他们是不是“特务”、“内奸”。“她一般不高兴的时候主动给人相面，但她高兴的时候很少，不高兴的时候极多，因此，无辜的好人吃苦的也就多了。”杨银禄说。

Q：四人帮和武斗是什么关系？

A：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张春桥为了夺取上海市的领导权，制造了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打伤九十一人。一九六七年五月，张春桥在济南支持王效禹制造武斗事件，拘捕关押三百八十八人。一九六七年五月，姚文元在济南参与支持王效禹制造武斗事件。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王洪文参与制造了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打伤九十一人。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王洪文组织、指挥了围攻上海柴油机厂的武斗，关押和伤残六百五十人。

Q：最新版《中国共产党简史》如何定性文革？

A：最新版《中国共产党简史》第206页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留下了及其惨痛的教训。”

第207页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和人民对‘左’的错误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正是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的抵制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抵制，社会主义建设在一些重要领域仍然取得一定进展，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没有改变。”

Q：审判四人帮时使用了1979年《刑法》，这样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A：符合规范。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Q：“淮海战役我指挥”是怎么回事？

A：关于“某某战役我指挥”这句话的传闻，纯粹就是极左蠢棍们别有用心的给总设计师蓄意抹黑！邓选的原话是“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由五个人组成，其中三个人为常委，我当书记。毛主席对我说： '我把指挥交给你。’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主持决定的。”他自己本人从来没说过 “xx战役我指挥”！另外，从1960年 9月出版的毛选，关于这件事也有清晰的描述！1960年版毛选第四卷第1297页的注释明确写明“总前委执行领导淮海战役前线军事和作战的职权”。这可是主席亲自校订的，极左蠢棍们还有什么说的呢？

Q：如何看待极左们一口一个工人阶级？

A：《中国职工状况调查数据1978——2018》中一份针对2万人的职工思想状况调查证明：工人阶级中赞成实行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占87.3%，赞成在农村推行各种形式责任制的占69.4%，赞成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占74.6%，赞成取消“四大”的占67.6%，赞成审判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占90.9%。由此可见，极左们无权代表工人阶级。

Q：康华是怎么回事？

A：康华是极左编造的谣言。2004年5月24日，合肥晚报发表《1988年轰动全国的“康华事件”》。该报道有一段：“事后查明，以上问题有的是属于代人受过，如 ‘走私汽车案’、‘劳务案’有的是属于定性不准，如‘贪污’、‘偷税’、‘套汇案’，等等。”极左网站在转载时，把这一段恶意篡改为“事后查明，以上问题有都有事实根据。”

Q：八十年代有什么比较重大的科技成就？

A：85式坦克、79式坦克、85式装甲车、昆仑发动机、秦山核电站、风云一号卫星、南极长城站、沈大高速、银河计算机、舟山直流输电工程、南越王墓的挖掘、法门寺地宫的挖掘、遥感卫星地面站、神光装置、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海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地奥心血康的研发、北京 35MeV质子直线加速器、合肥同步辐射装置、LX—PC联想式汉字微行机系统、《鲁迅全集》微机检索系统、89式火箭炮、我国第一个大型微量元素数据库系统、分子束激光裂解产物谱仪……

Q：有人说八十年代没有造过一艘驱逐舰？

A：遵义号驱逐舰（舷号：134），是中国研制建造的051D型驱逐舰（北约代号：旅大I级）。该舰于1978年11月19日在上海中华造船厂开工制造，1983年11月25日下水，1984年12月28日服役于中国海军东海舰队。

湛江号驱逐舰（英文：zhanjiang Destroyer，舷号：165）是051G型驱逐舰（北约代号：旅大II级）的首舰，1986年8月在大连造船厂开工建造，1988年8月1日下水，1989年12月30日交付南海舰队。

珠海号驱逐舰（英文：Zhuhai Destroyer，舷号：166），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研制建造的051G2型驱逐舰（北约代号：旅大Ⅲ级）之一。该舰1987年10月31日在大连造船厂开工，1990年10月18日下水，1991年11月21日正式入役。

除此之外含有桂林号、哈尔滨号等。

Q：卞仲耘怎么死的？

A：被宋彬彬打死了，后来宋彬彬被毛接见了。校长的丈夫王晶垚回忆说：“1966年8月 18日，卞仲耘同志遇难十三天之后，毛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北京红卫兵代表。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登上天安门，代表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给毛戴上红卫兵袖章——这个袖章上沾满了卞仲耘同志的鲜血。毛对宋彬彬说：‘要武嘛。’”

Q：八十年代研制了什么尖端武器？

A：东风11（DF-11）是中国研制的近程地地战术导弹，其出口型称M-11。1985年开始研制，1992年定型生产并出口。导弹全长9.75米，弹径0.8米，起飞重量3.8吨，采用一级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公路机动发射最大射程300公里，可携带一枚800公斤的高爆弹头或9万吨TNT当量热核弹头，命中精度为300米（改良型为150米）

东风15(DF-15)是一种近程地地战术导弹，其出口型为M-9。1984年开始研制，1988计定型，1991年服役。导弹全长9.1米，弹径1米，起飞重量6.2吨，采用一级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公路机动发射最大射程600公里，可携带一枚500公斤的高爆弹头或9万吨TNT当量热核弹头。命中精度为300米（改良型为100米)

东风-21（DF-21）是中国在巨浪-1号潜地导弹基础上发展的第二代中程地地战略导弹。1985年5月20日试射成功，1989年定型。导弹全长10.7米，弹径1.4米，起飞重量14.7吨，采用二级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公路机动发射最大射程为1800公里(东风-21A为2700公里)，可携带1枚600公斤的威力为30万吨TNT当量的热核弹头，命中精度为300米。

Q：WG时期也有一些成就，为什么仍然说 WG是浩劫？

A：以钢产量为例，1956——1966年，我国钢产量增长了1085万吨（在排除大跃进的因素下），1966——1976 年，我国钢产量增加了514万吨，1978——1988 年，我国钢产量增加了2345万吨。所以说确实是十年浩劫。

历年钢产量简图：

|  |  |
| --- | --- |
| 1956年 | 447万吨 |
| 1966年 | 1532万吨 |
| 1976年 | 2046万吨 |
| 1978年 | 3178万吨 |
| 1988年 | 5943万吨 |

Q：如何看待毛反对分田单干？

A：反对分田单干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什么关系？

包干到户这种形式，在一些生产队实行以后，经营方式起了变化，基本上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但是，它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基础上的，农户和集体保持承包关系，由集体统一管理和使用土地、大型农机具和水利设施，统一安排烈军属、五保户、困难户的生活，有的还在统一规划下进行农业基本建设。所以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将会逐步发展成更为完善的集体经济。

推荐阅读：《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分田单干有本质的不同》，《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1期

Q：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增长有多大贡献？

A：论文《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与农业增长——对1978-2004年中国农业增长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6年07期）指出：1978——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增长的贡献达39.98%，其对这一时期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所有解释变量。

Q：陈永贵支持农村改革吗？

A：陈永贵支持农村改革。1984年11月下旬，新华社记者陈大斌拜访了陈永贵。陈永贵对他说：“有人说我反对农村改革，反对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我为啥反对哩？……那些年，也愁死我哩！……啥办法都使啦，十八般武艺都使上了，就是没有办法把农业闹上去！可你看现在，不搞运动啦，不批啦，不斗啦，可一搞改革，生产忽啦上来了！市场上吃的用的，啥也有了！我这个人最认实。我咋不服气哩？我现在高兴着哩！”

Q：能举一个 WG破坏科研的例子吗？

A：可以。

王大珩（1915.2.26-2011.7.21），原籍江苏吴县（今苏州市），生于日本东京。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光学之父”，应用光学家，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文革爆发后，王大珩差不多每天和聂荣臻的秘书通电话。在比较危急的情况下，提出请求部队保护光机所，这个请求得到了聂帅的同意。这使得光机所在初期没有出大事故，不过文革后期还是没有幸免于难，许多科研人员都被关押了起来，有十位科技人员牺牲。

　　几乎每天都有人被突然送去隔离审查，不断有新的“特务”被供出来，越来越多的人受到了牵连。制造“长春光机所冤案”的正是时任吉林省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单奎章。

　　王大珩看不过眼，在一次大会上，他公开给单奎章提意见，“我的确认为单主任的很多做法是不适当的，甚至可以说是很过分的，我不同意这样做！这样做是要打败仗的！”单奎章脸色铁青，立刻做出决定将王大珩发配到下面劳动看管。

　　王大珩索性主动要求扫厕所。“就是堵住他们的嘴，这也是一个策略吧。只要是对所里有好处的事，不管是大事情、小事情、累的事情，还是动头脑的事，我都能干。”王大珩若干年后这样提起这段历史。

　　就在扫厕所的那段时间，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又有一百多名名老科学家、青年科技人员等被打成“特务”。王大珩不顾单奎章身居高位，“还是决心与他拼上一拼”。

　　1977年6月25日，王大珩终于等来了机会。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会议上，他以“关于光机所一场触目惊心的灾害”为题，首次揭发“长春光机所冤案”，痛揭“四人帮”爪牙单奎章在光机所的种种罪行。

　　1977年8月的全国科教工作座谈会上，王大珩再一次就“长春光机所冤案”作出情况汇报。

　　根据官方会议记录显示，8月5日有人谈到吉林科技界问题很大时，邓小平指示：“就从吉林那里着手。与王恩茂通个电话，请他们指定人专门解决科技界的问题。像吉林光机所单奎章动不动就把人送公安局那样的问题，要抓典型调查，集中解决，要把整个冤案平反。先平反再说，个别有问题的另作处理。”

　　此后，根据该指示，吉林省委对单奎章进行审查，移送司法部门依法严惩。省委还派出工作组进驻光机所，对一起起“特务”案件进行复查，证明被打成“特务”的166人全部都是冤案。至此，“长春光机所冤案”终于大白天下，彻底得到平反。

　　其实不止在长春，在上海，苏步青曾被戴上了“卖国贼”、“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送到学生宿舍3号楼关了6个多月，一共被批斗了100多次，以70岁高龄下放到江南造船厂劳动了好几年。即使在“四人帮”粉碎后，苏步青每天还要扫两次厕所，剩余时间躲在房间里搞数学研究。

　　而在同济大学，李国豪还因为是“校内最大反动学术权威”处于监管中，不允许自由行动。即使是会诊南京长江大桥，也是被押去南京的。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的黄金平研究员，至今提到那年的科技教育座谈会，仍然有些激动。“会上，苏步青的确是第一个发言，说要推翻"两个估计"，要实事求是地估计教育战线的成绩和知识分子的现状。”黄金平说，“苏步青还提到，收到全国各地60多位爱好数学的青年寄来的论文，其中10多位青年很有数学才能，可以作为研究生培养。邓小平马上对身旁的教育部负责人说，通知这10几位青年，让他们到苏步青同志那里考研究生，来回路费由国家负担。”

1977年8月8日，科技教育座谈会圆满结束。此后，王大珩回来了，为中国带来了激光核聚变、跟踪经纬仪；苏步青回来了，为中国微分几何奠定了最厚实的基础；　李国豪回来了，为上海带来了洋山深水港和黄浦江上那么多座大桥……一个充满了科技与理性光辉的时代回来了。

摘自《新闻晨报》

Q：粉碎四人帮是政变吗？

A：粉碎四人帮不是政变，因为在粉碎四人帮前，华国锋等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征得了绝政治局大多数成员和其他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干部的同意。时任政治局委员吴德在其口述回忆录《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中说：“9月26日或27日的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我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我表态支持华国锋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曾四次与陈锡联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陈支持解决“四人帮”问题。”“我到陈锡联那里时，他正与杨成武谈事。杨走后，我向他说明了华国锋让我找他的经过（要陈锡联安排卫戍区部队交吴德指挥的问题）；陈说他已知道，随即就打电话向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交待，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指挥。”当天晚上，吴德负责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执行隔离审查。

（注：陈锡联也是政治局委员。）

Q：核潜艇下马了吗？

A：091核潜艇1965年研制，1968年开工，1970年下水，1974年服役；092核潜艇1971年研制，1978年开工，1981年下水，1984年服役，1988年完成潜射试验；093核潜艇1995年研制，1998年开工，2002年下水，2006年服役；094核潜艇八十年代末开始研制，1996年立项，2004年完工。我看不出来有什么明显的隔阂或断层。

Q：那黄老说核潜艇下马是怎么回事？

A：该内容出自《现代舰船》2004年12月下半月刊登的《龙啸九天——中国核潜艇专家采访录》一文。原文内容是：“88年，核潜艇进行了最后两个大的试验……两个试验成功后，聂力问我有什么感想，我说：‘一喜一忧’。当时冷战刚刚结束，很多军工项目都在下马。我高兴因为我打成功了，但大概明天我们就失业了。如果打不成功，我们还可以再吃几年饭，因为你们还会投资。聂力听完也哭笑不得。果然，打成功后，我们项目就下马了，一下就是 20几年。”那么问题来了：从 1988年2004年只有16年时间，哪里来的二十几年？黄老不会连数都不会算吧？

而且据资料显示，093核潜艇研制过程一直是在高度戒备之下绝密进行，且1988年后黄旭华把接力棒传给了第二代核潜艇研制人员，离开一线。因此黄老很有可能是因为保密原因才编出下马二十几年的话。

Q：如何看待八十年代初期有一些军工下马？

A：首先，有军工项目下马是很正常的事情。美国曾于2004年下马科曼奇直升机项目。前三十年也下马了一些军工项目，例如，由于技术储备和研制经费不足，轰-8项目在1971年9月终止。其次，八十年代初下马的一些军工项目都是事出有因。以空警-1为例，由于在雷达数据处理和信息传送环节上，缺乏实用的人机界面，不得不折中依靠手工标图和语音通信传报空情；存在明显的技术缺陷，主要是机载雷达无法消除地物回波干扰，不具备探测陆地上空低空飞行目标的能力，除青海湖、渤海湾上空能看到目标（有时还不连续）外， 陆地上各种地形的地物回波很大，且难以消除，探测效果不好；中国国内无法研制配套的机载预警雷达；台湾国民党飞机的袭扰渐渐平息，中国大陆的雷达网已经逐渐完善，对于空中预警机填补盲区的紧迫程度有了缓解等诸多原因，空警-1试制项目中止。

Q：能举一个 WG践踏法制的例子吗？

A：可以。

1966年12月，谢富治与陈伯达、张春桥等人合谋，制定《公安六条》，即《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颁发全国，其中规定，凡是以匿名信、传单、标语、口号“攻击诬蔑”林彪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依法惩办 ";“攻击诬陷”中央文革小组的，是“反动行为”，“情节严重的，要依法惩处”。这样，谢富治就把保护林彪、江青一伙法律化了。他们勾结一气，为所欲为，信口雌黄，栽赃陷害。一大批革命同志就因为违反这个《规定》 而遭受迫害，有的被关押，有的被判刑，有的甚至惨遭杀害。优秀青年遇罗克，就因为不同意反动文痞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的观点，就因为认为“陈伯达用封建时代的词句歌颂毛主席是不合适的”，就因为批判了反动的血统论而撰写了《出身论》，就被判处死刑,年仅27岁。

Q：如何看待毛制止武斗？

A：全面夺权后，各地武斗的烽烟四起。毛不仅未及时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制止武斗，而且继续不计后果地支持所谓“革命左派”。尽管在1967年他陆续批准周总理提出的关于制止一些地方武斗的建议，但这并不表明他已经下决心坚决制止武斗。例如，1967年12月18日，毛接见以谢佩奇为首的阿尔巴尼亚中国友好协会代表团，在谈到各地武斗时说：“要打就打，我主张打。他要打嘛，不是我要打。凡是打得厉害的地方，解决问题比较容易。北京不痛不痒，太文明了。”1968

年，全国武斗越来越严重，造反派的破坏活动更加猖狂，暗藏在造反派中间的反革命分子已明显暴露，人民群众对这种情况已经十分不满，局势已经发展到失控的地步。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人民共和国大厦有倒塌的危险。到了这个时候，毛才下定决心制止武斗。周才可以比较放手地运用法律武器打击严重违法犯罪的造反派坏头头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以更加有效地平息武斗。

Q：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吗？

A：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中国大地，遵义的造反派联络大串联来到遵义的外地学生，打着“造刘邓路线的反”的旗帜，到遵义会议纪念馆抄出1959年中央档案馆给遵义纪念馆的复信，诬蔑邓小平“篡改历史，硬将自己塞进遵义会议，捞取政治资本……”在当时“清算”邓小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有“罪行”中，这一条无疑是他的重大“罪状”之一。于是，邓小平的名字在遵义会议会议室的说明牌上被打上黑×，照片被从会议室墙壁上摘掉。

对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身份，直到1984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公布了《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以后，才将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时的任职弄清楚——中央秘书长。关于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遵义会议，有如下这些佐证：

一是邓小平过去填写的履历表中，关于此期间的职务，一直填的是中央秘书长。邓颖超说过，遵义会议时，邓小平是中央秘书长，这一点“我完全可以证明”。

二是1984年，有关部门在为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我国主要领导人的传略条目时，曾就此问题请示过邓小平本人，邓小平说他1934年底开始任党中央秘书长。

此外，1984年10月26日，杨尚昆答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就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时任职的提问时说：“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到遵义，遵义的同志问都是哪些人参加了遵义会议，我一一作了回答。他们又问邓小平同志是否参加了？我说好像不记得他参加了。回到北京，我问周总理，总理说小平同志参加了。当时担任会议记录，他是党中央秘书长。”1984年，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访问刘英。刘英说，遵义会议后不久，邓小平被派往作战部队，中央秘书长的工作由我接替。

综上所述，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任职已经相当清楚了。

至于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为什么没提到参加者中有邓小平，我们应当加以分析。应该看到，陈云的这个提纲只是为传达会议的主要内容而写的，不可能面面俱到。关于参加会议的人员，提纲里除没有提到作为中央秘书长参加会议的邓小平外，也没有提到当时也参加这次会议的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

对于造反派批判邓小平“篡改历史，挤进遵义会议”这一点，邓小平始终没有承认。上世纪70年代，一个老干部的孩子去看望邓小平，闲谈中提到这件事，邓小平还不无感慨地说：“遵义会议，我参加了就是参加了，没有参加就是没有参加。我一生的历史……不因没有参加遵义会议硬说参加了，来增添一份光荣……”

1976年10月，中国终于结束了延续十年的动乱，被颠倒的历史又重新恢复本来面目。1980年，中国革命博物馆、遵义会议纪念馆以及其他有关党史资料、书籍中，在介绍遵义会议的参加者时，又重新出现邓小平的名字。

Q：邓指挥了淮海战役吗？

A：推荐阅读此文https://m.sohu.com/a/120641302\_557768

Q：有没有当事人的回忆资料？

A：1948年10月31日，粟裕在电报中向毛建议说：“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毛对粟裕的这个建议很重视，经过一番考虑研究后，11月 1日回电表示同意。粟裕看到回电后非常高兴。两个野战军从战略协同，走到战役协同是他的宿愿。早在1948年1月22日的电报中就有这个思想，他说两个野战军在一起协同作战，在中原地区集中兵力，打几个大的歼灭战，战局必有很大的改观。因而，毛回电同意后，粟裕怎能不高兴呢！他认为从组织上明确解决了统一领导问题，这为取得整个淮海战役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同时，他认为这也是南线决战的一个重要条件，因为光靠一个野战军是打不成这么大规模战役的。他还说：“南线决战的第二个重要的条件，是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没有辽沈战役的胜利，我们是不敢下这个决心的。——以上是粟裕的秘书鞠开回忆

Q：WG期间没有腐败吗？

A：推荐阅读此文https://mil.huanqiu.com/article/9CaKrnJGB4f?from=bdhd\_site

Q：有 WG时期腐败案例吗？

A：有的。1979年4月23日，黑龙江省破获了一起该省最大的贪污集团案件。罪犯王守信等人全部落网，被依法逮捕，参与分赃、窝赃、转赃犯罪活动和与此案有牵连的重点人，也都分别进行审查。这个贪污集团自 1972年以来，共贪污人民币53万余元，相当于该公司现有固定资产的两倍。首犯王守信(女)是文革中投机起家的、钻进党内的坏分子，原任宾县燃料公司党支部书记兼经理。王守信乘文革混乱之机，靠投机钻营，打击干部群众，“造反”上台，当上宾县燃料公司经理。上台后一手抓权，一手抓钱，不择手段地大量鲸吞国家财富，从 1971年11月起到1978年6月止，王守信贪污和侵吞物资折价共 507702元。其罪行败露后，多次与被告马占清、姜淑芝等人订立攻守同盟，并指使马占清灭证转赃，负隅顽抗。破案后已缴获赃款413325元，缴获赃物折价70014元。上述事实证明，被告王守信实属罪大恶极，国法难容。根据人民检察院的起诉，经过公判调查、法庭辩论、合议庭评议，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法判处贪污犯王守信死刑。1979年10月20日，被松花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死刑。1980年2月8日，轰动海内外的 “建国以来最大的贪污犯 ”——原黑龙江省燃料公司党支部书记王守信在哈尔滨伏法。

Q：1976年中国 GDP世界第六，是真的吗？

A：某些兄弟们，别总拿着1976年中国GDP排世界第五还是第六这种数据幻想了行不？

1976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是1.88比1，然后算出来 2000亿美元的 GDP，这叫打肿脸充胖子。

当年也没啥人能够出国，也没啥出口，所以汇率和普通百姓没有任何关系，你定成 1人民币换 100美元都行，直接就宇宙第一大国了。到了 80年代初，进出口增加了，出国的人也多了，就发现这个汇率的问题了。

举例说，你生产一件衣服，国内卖 20元，换算成美元10美元，而国外一件同样的衣服才5美元，你能卖出去就怪了。没办法，就只能降价卖，标价 5美元.再换回人民币，不到10元，卖一件亏一件。

咋办？只能另外规定一个“贸易结算价”，对外贸企业使用。

1981年的公开汇率是 1.70比1，而贸易结算价是2.8比 1，前者能用来计算 GDP，后者才是真正的结算价格，否则外贸企业就不干了。

即便是2.8比1的汇率，在实际操作中仍然不够，所以又有了出口补贴的制度，你亏多少，财政就给你补多少。也就是当年中国那点出口对西方国家没啥威胁，否则一个倾销的帽子妥妥地给你扣上。

当年有许多“黄牛”专门蹲在机场外面等外国人换汇。外国人在机场柜台换外汇，1美元换不到2人民币，黄牛则可以出到4元、5元的价格。

“黄牛”拿到外汇之后，一转后，就可以用更高的价格卖给那些需要外汇的人，主要是一些要出国考察的干部，这些人需要到国外去买电器，而国家又不可能给他们换外汇。这些黑市美元最高可以达到1比 10的汇率。

在黑市1比10的情况下，定一个1比2的汇率，然后宣称自己的GDP排名世界第几，这有啥好吹的？

某些“学生加战友”已经沦落到只能靠这种幻想来找存在感的地步了吗？你们的学艺已经不精到这种程度了？你们究竟有没有认真读过自己最喜欢用来“传教”（把科学当成神学，不得不说是科学的悲剧）的文章？

Q：改革初期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如何？

A：1978年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城镇57.5％，农村67.7％。

2000年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城镇39.4％，农村49.1％。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1965年为 68.5％，1978年为67.7％。

Q：邓给日本国旗鞠躬是怎么回事？

A：邓是在给日本国旗旁的中国国旗鞠躬。

Q：改开前二十年似乎铁路修得不多？

A：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掀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此后，铁路建设步伐加快，上世纪 80年代“南攻衡广、北战大秦、中取华东”；90年代“强攻京九、兰新，速战宝中、侯月，再取华东、西南”；到世纪之交，先后建成了大秦、京九等铁路干线，衡广、兰新等铁路复线，以及一大批铁路干线电气化改造项目。

这一时期的重点并非新建线路，而是补短板，把已有铁路升级改造，解决运力紧张卡脖子问题。当年把京广兰新改成了复线，增建了一堆编组站和信号设施，一堆线路电气化，在极左眼里这些工程都不做数，一寸里程都不增加。

既然极左也讲了宝成、成昆、鹰厦铁路，那就请感受一下这些铁路能跑多快吧——这些铁路由于技术所限，“手提肩挑”，当年修的时候弯弯绕绕，跑不了几十公里的速度，自力更生时期有比没有强，但能适应改革开放以后的高速发展吗？现在它们早已经退居二线了。

Q：光刻机在改开下马了？

A：光刻机在改开非但没下马，还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以下新闻报道摘自权威报刊：

上海光学机械厂在有关局、公司的领导下,于 81年6月9日～12日在上海召开了产品鉴定会 ,对 JKG—3型半自动接近式光刻机进行了鉴定,并通过了设计定型。参加鉴定会的有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国家仪器仪表工业总局、上海市委、上海仪表局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技术专家等。——《仪器制造》杂志1981年05期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制的“扫描式投影光刻机”于一九八五年八月廿一日通过了由上海市科委和中科院上海分院联合组织的鉴定。——《光学学报》杂志 1985年12期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机所研制的 OST-1型一步法投影光刻机、Stepper亚微米光刻镜头和氦-氖双频激光干涉仪于1987年10月28日在沪同时通过鉴定。——《中国激光》杂志 1988年03期

一九八八年国际电子生产与半导体展览会于四月十九至二十四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参加展出的有国内、外近一百四十家公司和厂商,其中国内参展单位二十七家。 在这次展览会上,国产专用设备和电子元器件首次与国外产品同台展出。电子部 45所送展的QP—4A型内圆切片机、GK—2A型光刻机、TZ—3C型自动多探针和TKZ—2 型探卡装调仪等六项设备样机 ,受到国内外参观者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电子工业专用设备》杂志 1988年02期

我国在DSW投影光刻机研制中 ,一台后起之秀在中科院光电技术研究所(成都)脱颖而出。1990年 3月 12～13日在成都由中国科学院召开该机研制评议会。邀请了国家科委、机械电子部、丰德公司、清华、浙大、中科院有关领导及几个研究所和一些企业的 26个单位46名同行专家参加。中科院光电所研制的 DSW投影光刻机通过中科院评议。——《电子工业专用设备》杂志 1990年02期

一种新型分步重复直接投影光刻机 (DSW)——BG—101J 分步光刻机最近在机电部第 45研究所研制成功。北京半导体器件三厂对该机进行了考核验收 ,认为其主要技术指标全部达到设计要求,对该机的指标...——《电子工业专用设备》杂志 1991年03期

Q：那么武汉无线电三厂是怎么回事？

A：武汉无线电三厂是造收音机的，用的是接触式光刻机，不涉及尖

端技术。

Q：如何看待运十下马？

A：运十项目仓促上马，172个问题你搁这造飞行棺材呢？

Q：有 JQ迫害毛的事实吗？

A：江青迫害毛的事实：

9月8日，毛已进入弥留状态。这天一早，江就窜到新华印刷厂说什么：“我到你们这里，是向毛请了一个小时的假……”从新华印刷厂又直奔毛的卧室，她不顾毛的病情，也不听医护人员的劝阻，以给毛翻身为由，寻找毛可能留下的遗嘱和毛文件柜上的钥匙。她给毛这么一翻身，致使毛主席颜面青紫，血压上升，医护人员不得不实施抢救。但一直没有取得明显效果，显然，不适当的翻身，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江则像没事人似的，她又到别处闯荡去了。

——摘自陈长江的回忆

注：陈长江是毛的警卫队长，跟随毛二十七年。

Q：有邓支持两弹一星的证据吗？

A：邓支持两弹一星的证据：

1962年10月30日，罗瑞卿向中央呈送《关于成立加强对原子能工业领导的十五人委员会的建议》。11月2日，邓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送主席、刘、周、朱核阅。”

Q：八十年代有扶贫吗？

A：有。比如三西扶贫。

Q：八十年代科技下马是真的吗？

A：“七五”（1986——1990）科研攻关计划共获得专题成果（包括子专题成果）10462项，其中达到或接近80年代国际水平的有6068项，占 58%；与国内技术现状对比分析，属国内领先水平的有 4163项，占 39.8%，属填补国内空白的有 4112项，占39.2%。说好的科研下马呢，极左脸被打得啪啪响。

Q：WG冤案怎么制造的？

A：文革冤案纪实：南京铁路局建筑工人萧经业，在一座不断冒烟的土窑西侧作业，因刮东风弄得他烟灰满身，说了句 “刮西风就好了”，就说他与毛主席的“东方压倒西风”唱反调，被管制三年。1978年7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其无罪。

Q：毛支持过浮夸风吗？

A：支持过。请看以下报道：

毛主席对徐水县人民的干劲表示满意。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向毛主席汇报说，徐水县秋季要收十一亿斤粮食。毛主席听了很高兴，问张国忠说：“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张国忠表示还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哩！”毛主席指示说，还应该考虑到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毛主席又指示徐水县委要早抓明年的粮食规划，要多种小麦、多种油料作物，种菜也要多品种，这样来满足人民的需要。

——1958年8月1日《人民日报》

毛主席从棉花地里走出来向社干部说：“象这样的棉花有多少？”社长王文生说：“七里营生产队一万零五百亩，有五千亩是这样的。每亩保证皮棉一千斤，争取两千斤。”毛主席笑着向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象这样就好了。”吴芝圃说：“有这么一个社就不愁有更多这样的社”，毛主席说：“对！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 ”。毛主席在襄城县的粱庄农业社、十里铺薛元农业社等地观看了烟叶和谷子生长的情况。这里种的云南多叶烟，已经长到一人多高，每棵有七十多个叶，每亩计划产三万斤。毛主席高兴地走到烟叶地里，仔细地观看了烟叶的生长情况，并且向粱庄农业社的党支部书记张富德等详细询问了烟叶的种植和收获等方面的问题。在长葛县“五四”农业社，毛主席观看了长得很好的麦茬玉米。这里有四十亩密植麦茬玉米，已经长到六尺多高，计划亩产两万斤，附近的另一块干部玉米试验田长得更好，计划亩产两万五千斤。毛主席称赞了这些生 长良好的玉米。毛主席问县委书记吕炳光今年的产量，吕炳光说：“保证一千五百斤，争取两千斤。”毛主席笑着问：“能达到吗？”吕炳光满怀信心地说：“一定达到，秋后到北京给主席报喜。”

——1958年8月12日《人民日报》

这里的水稻生长很好。毛主席一边看，一边向社主任李书成询问水稻的品种、深耕、密植等情况，李书成一一作了回答。当毛主席问到计划产量时，李书成说：“五十亩高额丰产田，原来计划亩产两万斤，现在我们要争取四万斤，过去一亩只产二、三百斤。”毛主席听了高兴说：“好，你这个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干大的。”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

Q：为什么说毛泽东要为大跃进负责？

A：从1955年第四季度开始，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一股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势头。这股冒进风的出现，给国民经济造成了相当紧张和混乱的局面。针对这种情况，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周恩来、陈云等人提出了一系列正确措施，及时地纠正了当时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倾向，从而使1956年的经济建设避免出现大的曲折，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毛泽东对“反冒进”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认为当时的主要危险不是“冒进”，而是“右倾保守”。1957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周恩来、陈云在刘少奇等人支持下提出的在1956年经济建设中开展“反冒进”的正确决策提出批评。从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起，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上，对1956年的“反冒进”批判日渐升温，认为“反冒进”泄了6亿人的气，和资产阶级右派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明确以后不能再提“反冒进”的口号，只能反右倾保守。这一批判被认为是批掉了实事求是和中共八大的正确路线、批掉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批掉了综合平衡和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对“反冒进”的否定（俗称“反反冒进”），不仅促使经济建设背离了客观规律，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而且把一些工作中的不同意见指责为“右倾保守”，产生了重大决策缺乏民主论证的弊病，直接导致了“大跃进”运动的发动。

Q：毛泽东还有什么鼓吹浮夸风的行动？

A：新华通讯社1958年11月13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2632期刊载的报道《安国的小麦千亩天下第一田》。介绍了河北省安国县伍仁桥东风人民公社在开展播种规格化、种植区域化、耕作园田化的小麦大面积丰产运动中，搞的一块“千亩天下第一田”的情况，说这块千亩麦田埂直如线，畦平如镜，土粒胜如筛过，畦埂犹如刀切，计划平均亩产二万斤。1958年11月20日毛泽东批示：“此件可看。” 毛泽东的批语和这篇报道后作为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在会上印发。

1958年11月，毛泽东对《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写了批语，对该县在大办人民公社中推行的工资制、供给制、公共食堂等改变集体所有制的做法大加赞赏。该文在描写人民公社的“天堂”时写着：“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从此，农村人民公社开始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

Q：为什么说文化大革命是针对无产阶级的？

A：王进喜，甘肃玉门人，是新中国第一批石油钻探工人 ，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1938年，15岁的王进喜进入玉门石油公司当工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玉门石油管理局钻井队长、大庆油田1205钻井队队长、大庆油田钻井指挥部副指挥。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率领1205钻井队艰苦创业，打出了大庆第一口油井，并创造了年进尺10万米的世界钻井纪录，展现了大庆石油工人的气概，为我国石油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中国工业战线一面火红的旗帜。毛主席曾亲切接见他，还用稿费请他和钱学森等人吃饭。然而“文革”一开始，江青、康生等人就批判北京历史博物馆的大庆展览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陈伯达亲自写信，要求造反派在大庆“打倒一切”。造反者“砍旗先砍扛旗人”，王进喜自然也不能幸免。1966年11月，张春桥宣告王进喜是既得利益者。轮番批斗、人身攻击一股脑地加在了王进喜的身上。甚至在批斗会上，有人高喊：“大庆红旗是假的，铁人是假的。”王进喜忍无可忍冲上辩论台，高声怒吼：“我是铁人还是泥人，关系不大。大庆这面红旗是谁也动摇不了的……谁敢诬蔑大庆红旗，我们就一拳把他砸到地底下去！”但是正义的呼声却带来更为残酷的“往死里整”的摧残。某天，造反小将们手持皮带和铁棍，强行带王进喜进密室，要他在一张事先写好的咒骂大庆红旗的纸上签字。王进喜是一把硬骨头，死活不签。

时传祥是又一个例子。时传祥（1915年9月20日-1975年5月19日），男，汉族，山东齐河人，195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当掏粪工人，新中国第一代劳动模范，中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1966年的国庆节前，毛泽东同志特意把全国劳模、掏粪工人时传祥同志接进中南海小住。国庆节当天，时传祥同志作为贵宾被请上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活动，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然而1966年12月27日，江青在北京部分大专院校师生座谈会上说：“时传祥已完全是个工贼，被收买了。”在此后不足半年的时间里，时传祥被揪斗200多场，最多时一天达四至五场，时传祥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到了1971年，时传祥已经被迫害得大小便失禁，身体极度虚弱。虽然在1973年周总理指示保护时传祥，但由于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时传祥被迫害致死。